



● 作者/Raymond Adams ● 譯者/高一中 ● 審者/劉宗翰

加利波利戰役： 戰略目的與手段的脫節

The Gallipoli Campaign: Learning from a Mismatch of Strategic Ends and Means

取材/2015年第4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s Quarterly*, 4th Quarter/201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加利波利戰役中，協約國因戰略目的有誤，加上缺乏支持此等目的之手段，而遭致慘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同盟國記取教訓，改正相關缺失，便獲致截然不同的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始於1914年7月28日，也就是奧匈帝國王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遭暗殺後的一個月。¹ 大多數歐洲人都認為這場戰爭將很短暫——最普遍的說法是「到聖誕節時就會結束」——而且消耗的人命與軍費都相當有限。然而，不旋踵，敵我雙方即沿著漫長的防禦戰壕形成對峙局面。西部戰線很快就成為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暴力殺戮戰



1915年，澳大利亞軍隊抵達埃及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港，經整裝後準備啟程前往加利波利半島的戰場。(Source: AP/達志)

1915年3月18日，英國主力艦無敵號(HMS Irresistible)在狹窄堡壘(Narrows' Forts)攻擊行動期間，由於行經達達尼爾海峽，碰觸漂雷而遭炸毀，最後落得棄船沉沒的命運。

(Source: Royal Navy/Library of Congress)



場；到了1915年1月，英法聯軍和德軍的傷亡總人數已高達20萬人左右。²

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軍隊在戰場上卻未能調整戰術，以因應威力非常強大的新武器，故傷亡慘重。英國的政治領導人、媒體和民眾大聲疾呼要採取行動以打破僵局。英國戰略家遂決定在東部地區開闢新戰線，期能達成兩個戰略目標：藉由攻打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將土耳其逐出戰場，

為受困的俄國盟邦打開一條通道。³ 英國於1915年在東部開闢第二條戰線的決定，並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頭一年裡達成其戰略目標。英國領導人基於政治權宜考量，卻在土耳其追求短期軍事目標，此舉不但在軍事專業構想上不夠完備，並與打敗德國贏得勝利的整體目標背道而馳。本文檢視此次企圖開闢第二戰線的災難性後果，以及協約國戰略目標與手段的脫節。

進軍達達尼爾海峽決定

由於直接攻擊位在法國與比利時境內的強固敵陣地顯然徒勞無功，英國戰略家開始研擬新的作戰計畫。⁴ 英國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構思在北海遂行兩棲作戰，俾對德國施壓。他提議沿比利時海岸線展開英法聯合兩棲突擊作戰，以包圍西部戰線上的德國陣地、解放哲布勒赫(Zeebrugge)港，進而阻止德國把哲布勒赫港和奧斯坦德(Ostende)港當作其



潛艇基地。⁵ 最後，英國未能說服法國參與，邱吉爾的這項北海作戰計畫因而胎死腹中。

接下來，英國政治與軍事領導人將注意力集中於土耳其，並研究發動軍事作戰以奪取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⁶ 攻擊君士坦丁堡並打開一條連接俄國交通線的可行性。戰時內閣秘書長韓克(Maurice Hankey)、財政大臣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和邱吉爾主張對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島(Gallipoli Peninsula)遂行軍事作戰。⁷ 他們一致認為，鄂圖曼帝國已經衰落，「此時透過攻擊德國的盟邦，或許能最有效地打擊德國，也最有利於維持長久的世界和平。」⁸ 因此，在大戰爆發後的數週內，英國的注意力已轉移至東部。

1914年8月底，邱吉爾正式請求陸軍大臣基欽納(Herbert Kitchener)元帥召集一群陸、海軍軍官研擬奪取加利波利半島的計畫，「目的在於讓一支英國艦隊進入瑪摩拉海(Sea of Marmara)」，最後迫使土耳其退出戰爭。⁹ 陸軍部與海軍部的代表開會討論後斷定，攻擊加利波利半島的行動，就軍事觀點而言並不可行。¹⁰ 作戰局長考爾威爾(Charles Callwell)少將¹¹預判，加利波利戰役「可能是極其困難的作戰行動。」¹² 他指出，在達達尼爾海峽遂

行作戰，最少需要6萬名部隊加上威力強大的攻擊火炮，分兩梯次進入土耳其。¹³ 基欽納也不贊成開闢第二條戰線，但他有不同的理由。他認為英國的作戰重心應置於歐洲大陸，因此不願意將部隊調動到其他地區。

對立意見於焉形成：政治人物主張在加利波利半島開闢第二條戰線，而資深軍官則反對在土耳其展開干預行動。¹⁴ 雙方的辯論持續到冬季仍無結論。1915年1月1日，俄國正式要求英國「對土耳其進行海軍或陸軍武力展示，以減輕該國部隊長驅直入高加索山脈所形成的壓力」，情勢因而急轉直下。¹⁵ 英國決策者於1月初在戰爭委員會的一系列會議中，針對俄國要求及有關未來戰事的戰略方向，進行更廣泛的議題辯論。¹⁶ 該委員會最後決定，英國將持續與法國在西部戰線並肩作戰，英國海軍部將自1915年2月起，開始準備「入侵及攻佔加利波利半島的作戰，並以奪取君士坦丁堡為目標。」¹⁷

為達成發動作戰的決定，需要進行相關的官僚折衝與協商。接下來，英國領導人的重大任務，是要研擬用來落實戰爭委員會決策的戰略。最終計畫要求組建一支由六艘英國主力艦與四艘法國主



1915年在達達尼爾一役中，法國海軍的馬賽納號(Massena)軍艦因觸礁擱淺。(Source: AP/達志)

力艦組成的聯合部隊，外加一支規模龐大的護航船隊，浩浩蕩蕩地向達達尼爾海峽挺進，直到攻下君士坦丁堡為止。¹⁸

英國戰略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上

英國進軍達達尼爾海峽的計畫，係建立在一系列錯誤的假設上。政治領導人和軍事計畫人員都認為土耳其部隊欠缺戰技、勇氣和決心。¹⁹ 邱吉爾深信海軍的艦砲打擊有能力摧毀陸上目標。²⁰ 英國的作戰計畫人員假設，其主力艦隊可輕易突破敵人的海岸防禦、直接航行到君士坦丁堡，毋需登陸部隊支援就能奪取達達尼爾海峽。基欽納假設，一旦英法聯合艦隊通過該海峽，並以海軍艦砲瞄準君士坦丁堡，就能「迫使土耳其投降、建立一條補給線通往身陷困境的俄國、鼓勵巴爾幹半島諸國加入協約國的作戰行動，最後對奧匈帝國發動攻擊，俾對德國造成壓力。」²¹

基欽納進一步假設，一旦英法聯合艦隊入侵的消息傳到君士坦丁堡後，駐守色雷斯(Thrace)的土耳其軍隊將悉數撤退，



1915年左右，在協約國部隊即將撤離澳紐軍團灣(Anzac)之前，澳大利亞部隊在土耳其戰壕附近向敵人發起衝鋒。

(Sourc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英國因此得以控制土耳其。²² 英國外交大臣葛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則指稱，一旦英法聯合艦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君士坦丁堡將發生政變，接著土耳其將退出同盟國轉而加入協約國。」²³ 事後證明以上所有假設都是錯的，而其累積效應，則註定了達達尼爾海峽戰役將以悲慘收場。

達達尼爾海峽海戰

早在加利波利戰役正式開打之前，1914年11月1日，英國海軍部隊便對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

的堡壘進行砲轟。其目的與其說是企圖奪取該海峽，還不如說是要懲罰土耳其與「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站在同一邊的作法。這次砲轟比較負面的效應，是使土耳其的防禦兵力警覺到，英國未來可能在達達尼爾海峽遂行軍事作戰。在英國11月1日的攻擊行動之後，駐守加利波利半島土耳其部隊總指揮官阿塔圖克(Mustafa Kamal Attaturk)將軍和德國軍事顧問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將軍集中心力強化達達尼爾海峽的防禦工事。²⁴ 英法海軍聯合部



隊於1915年3月18日向達達尼爾海峽展開大舉進攻。戰鬥伊始，攻擊方顯然佔上風。發動攻擊前數天所進行的海軍砲轟有效摧毀了位在海峽入口處的好幾個土耳其防禦陣地。²⁵ 當天正午時分，英國艦隊已排除了土耳其布設在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的大多數水雷，剩下通往君士坦丁堡途中的九個水雷帶尚待處理。²⁶ 接著，出現了克勞塞維茨(Clauswitz)所稱「戰爭中的機運」(chance in war)要素。

英法聯合艦隊航向一系列未被察覺的20枚水雷，這些水雷是土

耳其輪船10天前才剛布設的。²⁷ 結果，三艘協約國的軍艦觸雷爆炸後沉沒；第四艘則受重創至無法挽救的地步。²⁸ 先前認為土耳其軍隊一見到英國海軍部隊就會投降的假設是錯誤的；而單單想靠海軍突擊作戰來打垮鄂圖曼帝國的期望也在3月18日幻滅。這次挫折促使英國戰爭委員會立即延緩進一步的海軍作戰行動。

英國戰爭委員會制訂了新的作戰方案，要求在愛琴海(Aegean)與瑪摩拉海之間，投入登陸部隊展開跳灘戰役(beach hopping campaign)，最後攻佔君士坦丁堡。²⁹ 然而，英軍指揮官從開始進行裝載與運輸作業，到把部隊送上加利波利半島，共耗時38天。在此期間，敵人已掌握先機。土耳其為了準備遂行下一回合的戰鬥，急忙部署了六個師的兵力、500名德國顧問及許多民工單位，以強化



在加利波利戰爭期間的土耳其砲兵部隊。(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該半島的防務。

加利波利半島的兩棲登陸戰

英國原先戰略目標為擊敗土耳其並開闢一條連接俄國的交通線，但在海軍攻擊行動失敗收場後，並沒有重新進行評估。事實上，歷史紀錄呈現了正好相反的現象：英國領導人變本加厲，最後投入了將近50萬名協約國部隊參與加利波利戰役。基欽納指派漢密爾頓(Ian Hamilton)上將擔任英、澳、紐、法聯合部隊總指揮官。漢密爾頓面臨極為艱鉅的挑戰。此時諸如機槍，以及可發射新一代高爆彈的精準火炮等新式防衛武器已然問世。他的任務是首度要在充斥著這些威力強大武器的時代中，冒著敵火強行展開兩棲登陸作戰。³⁰

1915年4月25日拂曉，英國、英聯邦自治領(Do-

minion)及其他協約國部隊涉水登陸赫勒斯角(Cape of Helles)的六處海灘。³¹ 接下來的兩棲作戰持續了8個月，但協約國部隊從頭到尾只在該半島上取得一個據點。諷刺的是，這場旨在打破西部戰線僵局的戰役，開始呈現出與法國及比利時境內作戰相似的風貌，不過其規模小得多。漢密爾頓的部隊要對付的，係加利波利半島上擁有強固防禦陣地且事先獲得警訊的敵人。³² 雖然基欽納與漢密爾頓都體認到，有關土耳其部隊的一個重要假設——他們是二流的作戰部隊，根本不是英軍的對手——顯然是錯誤的，但卻沒有因而改變其作戰方針。³³ 持平而論，英國軍事指揮官之所以持續遂行這樣的作戰，主要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使然。³⁴ 根據弗羅姆金(David Fromkin)的看法，「由於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是世界船運的樞紐，而東色雷斯位在歐洲境內，故這些戰略要點在英國領導人心目中佔有特殊地位。」³⁵ 誠如邱吉爾進一步強調的，「分隔亞洲與歐洲的這條深水航道，乃至為重要，我們必須竭盡所能確保這條航道的

安全。」³⁶

儘管該地區對英國的戰爭目標至為重要，協約國部隊仍然於1916年1月9日撤離該半島。原先想擊敗土耳其並打通連繫俄國通道的希望就此破滅。此時，英、澳、紐、法部隊的總傷亡已高達13萬人，然而英國政治領導人所設定的目標一項也沒達成。

目的與手段脫節

英國在達達尼爾海峽的經驗值得引以為鑑。該次作戰行動凸顯戰略目的與手段脫節的嚴重缺失。³⁷ 其初步作戰計畫——靠海軍一己之力強行進入達達尼爾海峽，並在航經加利波利半島的過程中，以水面艦火力摧毀岸基目標，進而迫使君士坦丁堡投降——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略目的與手段失衡的典型例子。在沒有派出地面觀測員的情況下，1915年以海軍艦砲攻擊陸基火砲陣地，甚或其他固定目標，通常成效不彰。³⁸ 雖然英法聯合艦隊在海軍作戰開打的頭幾天獲得有限度的戰果，但光靠海軍艦砲，想要沿著35哩長的海峽，對土耳其岸上防禦陣地施加毀滅性打擊，無異是天

方夜譚。再者，軍艦本身並沒有能力奪取及佔領土地。事實上，1915年3月，基欽納與漢密爾頓都未能研擬出可奪取並保住土地的持久計畫。

另一個有關目的與手段脫節的例子發生在加利波利半島的首波攻擊掃雷階段。當時協約國艦隊「將拖網漁船改裝成掃雷艇，並在漁民操作下，冒著敵火進行掃雷作業；此舉不啻是運用其能力最差的資產來執行該次戰役中最困難的任務。」³⁹ 即便是4月25日的兩棲登陸作戰也出現目的與手段的失衡。當天英、法及大英國協共有五個師的部隊，對著各個皆牢不可破的五個不同海灘，備有嚴陣以待的防衛兵力展開登陸行動。⁴⁰ 雖然在此次作戰的過程中，協約國不斷增加投入達達尼爾海峽的兵力，但卻從未能有效地長時期守住一個灘頭堡，其主要原因在於欠缺手段，也就是地面部隊。

此外，目的與手段失衡的典型例子也凸顯於英方的指揮管制中。

不當的指揮管制，阻礙了漢密爾頓在整個戰役中的作戰行動，



這種現象在登陸作戰最關鍵的頭幾天裡尤其明顯。漢密爾頓在伊麗莎白女王號(Queen Elizabeth)上監控登陸作戰……(然而),這艘船的設計構型並非用來做為兩棲特遣部隊的總部。因此,在伊麗莎白女王號上,漢密爾頓的參謀是分散在整艘船的各個地方。⁴¹

因此,指揮官在這次堪稱史上最大規模、最複雜的兩棲突擊作戰中,幾乎無力將其意志施加於自身部隊,遑論施加於敵人身上。在複雜軍事作戰的指管手段付諸闕如情況下,作戰目的幾乎無法達成。⁴² 此外,欠缺另外兩種手段——兩棲準則與事先的陸海軍聯合訓練——也阻礙了漢密爾頓精心策劃登陸作戰的能力。⁴³ 克勞塞維茨所提及的摩擦(friction)概念,加上缺乏指揮管制、兩棲準則,以及事先的陸海軍聯合訓練等因素,這些不良效應幾乎立即反應在戰場上。歷史紀錄中充斥著有關不當的指管導致問題惡化的第一手報導。一位澳大利亞士兵簡要地描述了加利波利戰役期間,數千名部隊所面臨令人氣餒的場景:「各營

分散成為好幾個群體,其中某些群體的作戰行動取得長足進展,卻無法獲得任何支援。這項因素,加上土耳其部隊增強抵抗的力度,導致我方指揮官普遍缺乏信心,認為部隊應該後撤。」⁴⁴

1857至1887年間擔任普魯士參謀總長的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曾指出,「戰略只能達成現有手段實際可能達成的最高目標。」⁴⁵ 在加利波利戰役中,英國的手段未能支持其戰略。在達達尼爾海峽的海上與陸上戰役中,協約國之目的與手段失衡,注定其整體作戰以失敗收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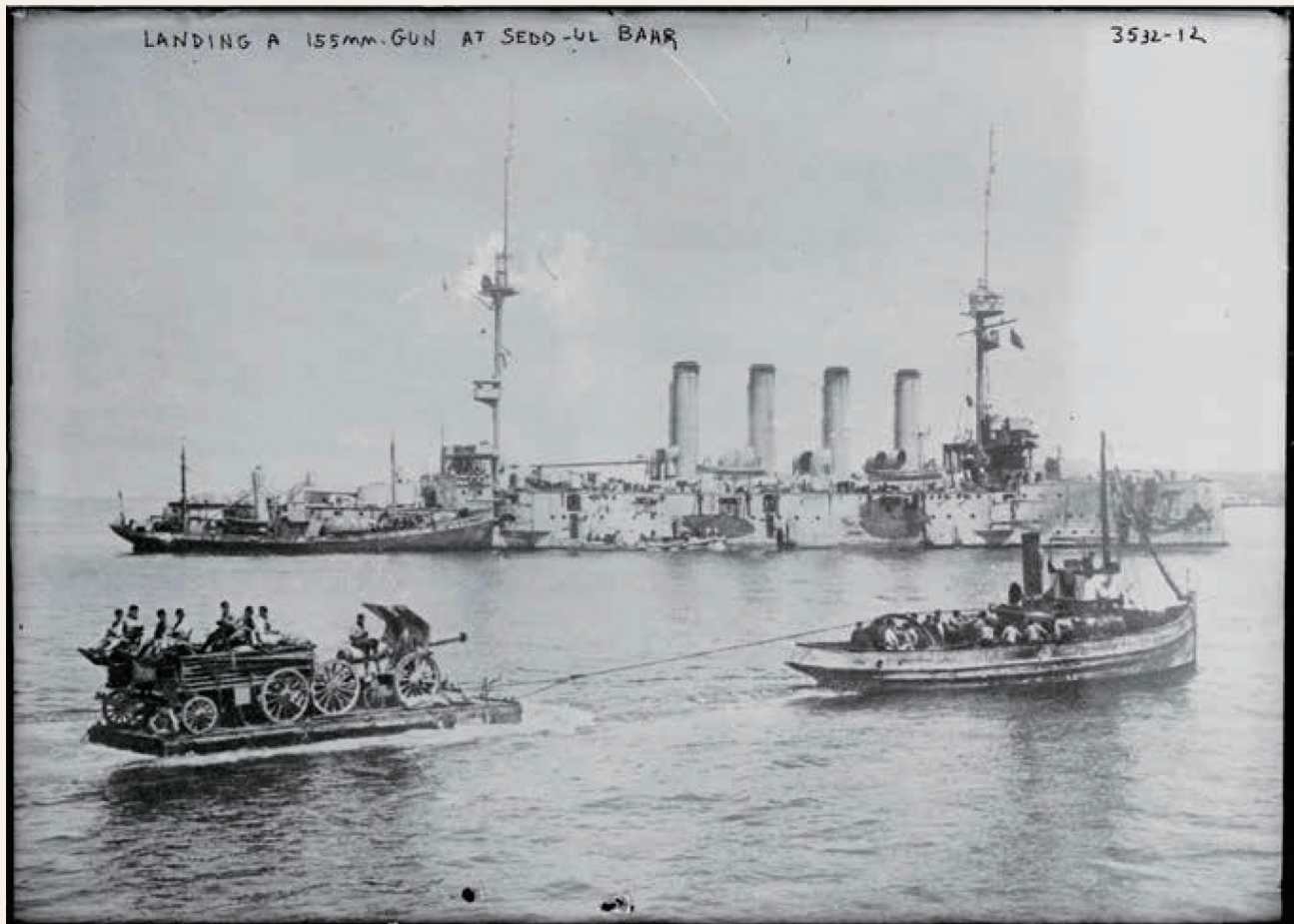
結論

戰爭的性質不斷改變。這點體現於19世紀戰術與20世紀武器的致命交會,並在1914年造成極其慘重的傷亡。慘烈的殺戮促使英國領導人尋求新的戰線,期能打破歐洲戰爭的僵局。戰略家主張在東部地區開闢新戰區。然而對土耳其遂行作戰,並打開一條連繫俄國通道的作戰計畫,因為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上而貽禍無窮,導致一開始協約國就做出僅用海軍在達達尼爾

海峽遂行作戰的不智之舉。六個星期後,協約國在喪失奇襲要素的情形下,再度發動攻擊。這次的第二回合攻勢,協約國派出一支規模更大的艦隊,並隨艦搭載五個師的登陸部隊。接下來的8個月,協約國遂行了一系列兩棲登陸作戰,但除了取得一個作戰據點外,別無其他作為。英國缺乏在達達尼爾海峽達成所望目的所需的手段,尤其是在指揮管制、準則、訓練及人力等領域。協約國想奪取達達尼爾海峽、迫使君士坦丁堡投降,並打通連繫俄國通道的企圖,最後以失敗告終。總之,協約國的戰略失誤,加上執行不當,故而未能達成其目的。⁴⁶

終曲：兩棲突擊戰的經驗教訓

對英國而言,達達尼爾戰役是個重大災難。在對加利波利進行登陸作戰失利後,世人普遍認為,欲對防守嚴密的海灘發動兩棲突擊這種極具挑戰性的軍事作戰,是項不可能的任務。兩棲突擊所面臨的艱鉅挑戰一呈現於指揮管制、兩棲作戰準則(或根本欠缺此種準則)、



在加利波利半島附近的軍艦將155公釐砲下卸至塞迪爾巴希爾(Sedd-ul Bahr)。(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軍種間協調，以及登陸後鞏固灘頭堡等各種面向一使得軍事及政治領導人深信從海上向陸地展開的作戰行動是徒勞無功。然而，根據克勞塞維茨的看法，「歷史案例可釐清每件事，還能提供實證學中最佳證明的方式。這點在戰爭藝術中特別真實。」⁴⁷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

裡，軍事計畫人員與理論家證實了克勞塞維茨認為戰史研究甚具價值的看法。渠等分析達尼爾戰役失敗的原因，並研擬準則、進行演習、建立適切的部隊架構，俾克服欲有效攻擊強固沿岸防禦陣地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在距離加利波利戰役一個世代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成功地使數萬名部

隊登陸由陣地堅固、裝備精良之德軍與日軍所防衛的海灘。同盟國在北非、歐洲及太平洋遂行的兩棲作戰，對於戰勝納粹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厥功甚偉。

儘管加利波利戰役以失敗收場，其所提供另一個教訓是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的重要性。二次大戰期間，此一作戰



方針在英國的戰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4年，邱吉爾偏好在北海對德國遂行兩棲作戰，以避開敵人在西部戰線上的主要防線。不到30年後，邱吉爾卻反對美國屬意在1942年年中時，跨越英倫海峽展開「圍捕作戰」(Operation Roundup)的計

畫。他主張先在北非、義大利及巴爾幹半島一據判是比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壘」(Atlantic Wall)更容易攻打的目標—遂行作戰後，才跨越海峽攻擊「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

最後，邱吉爾可說是加利波利戰役遺緒的最佳

註釋

1. 德國、奧匈帝國與義大利於1882年5月締結三國同盟。20世紀初，德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日益壯大，法、英、俄遂於1907年締結「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以制衡德國不斷增長的威脅。三國同盟的成員國有義務動用武力互相保衛對方；三國協約的成員國則有「道德責任」相互保衛對方。一項關鍵事件發生於1914年8月2日，鄂圖曼帝國簽署秘密條約，加入了三國同盟陣營。見Hew Strachan,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atalogue of Treaties: 1814-191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11; “The Road to War: The Triple Entente,” BBC Schools, available at <www.bbc.co.uk/schools/worldearone/hq/causes2_01.shtml>.
2. *Statics of the Military Effo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the Great War* (London: His Majesty's Printing Office, 1922), 237-252.
3. 戰爭伊始，俄國就遭受重大傷亡，尤其是在對抗德國的「坦嫩伯格」(Battle of Tannenberg)。英國擔心俄國會瓦解，因此想沿著達達尼爾海峽遂行作戰，一路打到俄國為止，以減輕沙皇承受的壓力。
4.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9), 124.
5. 同前註。
6. 達達尼爾海峽長35哩，入口寬2.5哩，在向東北方延伸4哩後寬度陡增至最大的4.5哩，接著縮減至不到1哩，此狹窄水道在延伸4哩後，寬度又增至3哩，其後維持此一寬度達20哩之遠，直到進入瑪摩拉海為止。這項地理資料引用自 Victor Rudenko, *Gallipoli: Attack from the S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
7. 同註4，第125頁。
8. 同前註。
9. Graham T. Clews, *Churchill's Dilemma: The Real Story Behind the Origins of the 1915 Dardanelles Campaign* (Westport, CT: Praeger, 2010), 44.
10. 同前註。
11. 考爾威爾是位具有影響力的軍事理論家。他曾出版過一本有關反叛亂的巨著，書名為 *Small Wars: Thei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99)。
12. Trumbull Higgins, *Winston Churchill and the Dardanelles: A Dialogue in Ends and Means*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57.
13. 同前註。
14. 弗羅姆金在註4的著作第127頁中指出，「軍事將領的信條是攻擊敵人最強的據點；而政治人物的信條則是攻擊敵人最弱的據點。」「政治人物」這種攻擊敵人最弱據點的偏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再度浮現出來。
15. Peter Hart, *Gallipol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
16. 同前註，第16頁。
17. 同註15。
18. Martin Gilbert,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One: 1900-1933*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63.
19. 同註15，第22頁。
20. 同註9，第37頁。
21. Gilbert,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363.
22. 同前註。
23. 同前註。
24. 同註6，第12-13頁。
25. Martin Gilbert, *The First World War: 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4), 136.
26. 同註21，第365頁。

化身。身為達達尼爾海峽重大軍事挫敗的主要設計師，他後來卻能成功地挽救自己在加利波利戰役之後的聲譽和前途，並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史上極為傑出的戰時領導人。協約國在加利波利戰役中，犧牲了大量人物力所學到的

教訓，總算沒有白費。

作者簡介

Raymond Adams係美陸戰隊中校，現為美國家戰爭學院學員。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s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27. 同註25，第136頁。
28. 同註9，第275頁。
29. 同註21，第365頁。
30. 同註15，第171頁。
31. 同註4，第157頁。歷史紀錄充斥著英勇事蹟和敵我雙方的慘狀。然而，詳細敘述戰術層級的作戰並不屬於本文的討論範圍。
32. 同註4，第561頁。
33. 「沉沒成本」(sunk cost)的概念適用於說明加利波利戰役。沉沒成本概念的理論，會使得決策者在像加利波利戰役這種敗象漸露的作戰行動中，想方設法彌補已經發生的損失，並以此作為其持續投入作戰費用的理由。
34. 英國在加利波利戰役中的決策，反映了典型「盧比肯戰爭理論」(Rubicon theory of war，譯註：指斷然下定決心一戰後，即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現象)的例子。根據這個理論，「當相關人員產生破釜沉舟的決心並認為戰爭迫在眉睫時，他們的心態已從心理學家所稱的斟酌(deliberative)階段轉移至執行(implemental)階段，並引發許多心理偏誤，最明顯的就是過度自信。」這個理論有助於說明，為何即便指揮官已體認到他們有關加利波利戰役的諸多重要假設有誤，英國的政治與軍事領導人仍未對其於達達尼爾海峽的整體戰略方針作出任何調整。有關盧比肯戰爭理論的資料來自Dominic D. P. Johnson and Dominic Tierney, "The Rubicon Theory of War: How the Path to Conflict Reaches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no. 1 (Summer 2001), 7-40.
35. 同註4，第548-549頁。
36. 同註4，第549頁。
37. 克勞塞維茨費了很大功夫討論將戰略目的與手段妥適連結起來的重要性。見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and 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7-147, et seq.
38. Jonathan Schroden, "Straits Comparis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1915 Dardanelles Campaign in the Context of a Strait of Hormuz Closure Event,"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September 2011, available at <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s/strait-comparison-lessons-learned-from-1915-dardanelles-campaign.html>.
39. 同前註。
40. Philip J. Haythornthwaite, *Gallipoli, 1915: Frontal Assault on Turkey*, Osprey Military Campaign Series 8 (London: Osprey, 1991), 45.
41. Gregory A. Thiele, "Why Did Gallipoli Fail? Why Did Albion Succe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World War I Amphibious Assaults," *Baltic Security and Defence Review* 13, no. 2 (2011), 139.
42. 作戰之目的在於成功地穿越達達尼爾海峽，使突擊部隊登陸敵方防衛嚴密的海灘，並持續支持這些部隊遂行作戰，最後迫使一個帝國的首都投降。
43. 同註41，第150頁。
44. Peter H. Liddle, *Gallipoli 1915: Pens, Pencils and Cameras at War*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Ltd., 1985), 45.
45. Grand [German] General Staff, trans. A.G. Zimmerman, *Moltke's Military Works: Precepts of War* (Newport, RI: U.S. Naval War College, 1935), Part II, 1.
46. 加利波利戰役之後，邱吉爾失去了第一海軍大臣的職位；漢密爾頓則失去了協約國聯合部隊總指揮官的職位。關於檢討這次作戰失敗原因的「加利波利委員會」(Gallipoli Commission) 所做出的結論，請參照，<www.nationalarchives.gov.uk/pathways/firstworldwar/transcripts/battles/dardanelles.htm>.
47. 同註37，第170頁。